

「元氣淋漓」與「絕大文字」 — 梁啟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



Pingyuan Chen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談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史學」，不能不涉及梁啟超等人竭力提倡的「史界革命」。1900年代的中國，在西學大潮激盪下，各種新銳學者紛紛提出革新史學的方案，或開始著手新史的撰述，其中成績顯著的有章太炎、梁啟超、陳黻宸、馬敘倫、夏曾佑、劉師培、曾鯤化等。^①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晚清主張史學革新者眾多，可影響最大的，卻非健筆縱橫的梁啟超莫屬。

今人分辨梁氏史學思想淵源，不難發現其對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多有借鑒。大約從1899年起，梁啟超的著述中就可見浮田和民的影響；只不過在《新史學》中，《史學通論》的烙印最為清晰可辨。梁氏並非全盤照抄，攝述中有所調整，而且「敘述更緊湊，條理更清楚，再加上有特色的語言，使讀者感到親切易懂，其效果反較直接翻譯為好」。據說這也是譯本雖多（在1902-1903年間《史學通論》共有六種中譯本），均不若梁文影響大的緣故。^②今人比勘譯本，不難發現梁文雖有所本，但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發揮——晚清學者並不忌諱「借鑒」，關鍵在於是否「合用」。比如，對傳統中國史學「四弊二病」的批判，便屬於梁啟超的自家心得。

批判「舊史學」，提倡「新史學」，涉及政治立場、民族意識、歷史觀念、著述體例，以及述學文體等。以往談論晚清以降的「新史學」者，多從立場及觀念入手，本文則更看好表述方式。不完全是拾遺補闕，在我看來，「革命」一旦成為「口號」，就不僅僅是時代風氣或思想潮流，同時也是極有感染力的文學表述。這一點，在文人氣很濃的學者兼政治家梁啟超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

只是後世研究梁啟超者，分屬不同專業，其對原本血肉豐滿、生機勃勃的任公先生的觀察、判斷與闡釋，多基於自家立場及理論預設，「史界革命」於是與「文界革命」等無涉。而這一分割，無論對於史學史研究，還是文學史論述，都是一大遺憾。因而，本文之鉤稽「梁啟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既指向史學，也指向文學。

一、「史界革命」與「文界革命」

談論晚清的「史界革命」者，莫不極力推崇梁啟超1902年發表於《新民叢報》上的〈新史學〉，尤其是以下極富感染力的表述：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

① 參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思潮初考〉，《史學史研究》1982年3、4期。

② 參見蔣俊，〈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文史哲》1993年5期。

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署，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③

這段首倡「史界革命」的論述，猶如荒野中的「吶喊」，當年曾激動過無數熱血青年。可如此名言，必須與同年11月發表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相比照，方能顯示梁氏為文的特色：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說始。^④

「改良群治」的「悠悠萬事」，到底該誰為大，是「史界革命」還是「小說界革命」？梁啟超並未給出明確答案。

再聯繫此前兩年的〈夏威夷遊記〉，其中也有關於「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的提倡。讀讀這些煽情的文字，你會發現，剛東渡日本的那幾年，梁啟超腦海裏充滿各種關於「革命」的想像。1899年底，赴夏威夷途中的梁啟超，在船上暢想中國詩文改革的方案，提出日後被史家再三論述的「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

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

讀德富蘇峰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書》數種。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⑤

也就是說，從1899年底到1902年秋，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裏，梁啟超竟然連續拋出四個同樣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小說界革命」。

這是一個需要口號的時代。能夠敏感到思想及學術潮流發展之趨向，將眾多零散的思考凝聚成一個口號，這是一種本事，需要某種「先知先覺」，更需要膽略與氣魄。要說對西學的理解，嚴復遠在梁啟超之上；要說國學的修養，梁啟超也無法與章太炎比肩。可作為思想潮流而被史家再三提及的，首先還是梁啟超的「革命」論述。以一人而包攬晚清四大「革命」的命名權，而且在每場「革命」中

^③ 《新史學》初刊《新民叢報》第1-20號（1902年2至11月），署名「中國之新民」，校訂本收入夏曉虹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處引文見夏曉虹編校本545頁。

^④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未署名），刊《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

^⑤ 〈夏威夷遊記〉舊題〈汗漫錄〉，初刊《清議報》第35-38冊，1900年2-3月。所引兩則日記分別撰於1899年12月25日和12月28日。

都能以身作則，多有創獲，這實在是個奇跡。只有在晚清這「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才可能出現如此局面。可這同時也提醒我們，此四大「革命」之間，存

在某種內在聯繫，並非像日後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樣，有各自獨立的疆界。

言說方式不太一樣，但所謂的四大「革命」，其核心都是「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並將其應用到各個專門領域，以改變傳統中國的文學及學術。這一思路，



梁啟超在日本神戶與華僑吳錦堂等人合影
(第二排中間右手持日本旗者為梁啟超)

確實在二十世紀中國佔據主流地位，難怪梁啟超如此簡要的表述，能激起當年以及後世無數讀者的強烈共鳴。可這裏的「革命」云云，只是表達了一種強烈的願望，包括選擇、動力、信心、方向感等。其所以激起如此巨大反響，除了順應西學東漸的大勢，滿足世人破除陳規陋習、尋求救國救民良策的熱誠，還與梁啟超特殊的表述方式有關。年少氣盛（1902年提倡「史界革命」時，梁剛到而立之年），「筆鋒常帶情感」，加上有「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報章做後盾，^⑥難怪梁啟超充滿自信，態度十分決絕。以日漸成熟的「新文體」，表達諸多關於「革命」的想像，二者相得益彰。

梁啟超1920年撰成的《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五節有關於自家「新文體」的描述，常被研究者所引述：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⑦

根據上下文，這裏的「至是」，指的是《新民叢報》和《新小說》。有這句話墊底，討論「文界革命」者，不必以梁啟超等人的政論自限，起碼可以包括雜記、

⑥ 梁啟超轉述犬養毅的意見，稱學校、報紙和演說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參見〈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⑦ 《清代學術概論》，見夏曉虹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195。

隨筆、評傳，以及某些史著。這樣一來，所謂的「史界革命」與「文界革命」，也就不可能真的涇渭分明。《新民叢報》第一號「紹介新著」欄對於梁啟超所撰〈李鴻章〉的評價是：「此書以泰西傳記新體，敘述李鴻章一生經歷而論斷之，其體例實創中國前此所未有。」^⑤似這般「前此所未有」的評傳，如〈南海康先生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等，乃談論「文界革命」或「史界革命」者都必須涉及的。

假如「史界革命」與「文界革命」互相溝通這一假設成立，《新史學》之〈論書法〉，便不該被忽略。以往我們多注意其對於傳統的「春秋筆法」的批評，倘若借鑒「文界革命」的思路，則以下這段話大有深意在：

吾非謂史之可以廢書法，顧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布爾特奇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讚歎舞蹈，頑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學《春秋》，侈衰鉞於一字二字之間，使之後讀者，加注釋數千言，猶不能識其命意之所在。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為優，若者為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鑒曰：吾儕宜爾，吾儕宜毋爾。而必不可專獎勵一姓之家奴走狗，與夫一二矯情畸行，陷後人於狹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無復發揚蹈厲之氣。^⑨

〈論書法〉一節乃梁氏的神來之筆，當初譯介進來的外國史學著作，未見有此名目。此舉既延伸了對於傳統中國史學的批判，也無意中透露了梁氏本人的趣味。本文即從此入手，希望窺探梁啟超「新史學」中不太為人看重的另一面。

二、政論文章與歷史著述

梁啟超所表彰的「書法」，以普魯塔克（Plutarch，46-120/127）和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的撰述為榜樣，這點很值得注意。關於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英國史學家吉朋，除《新史學》外，梁啟超還在〈自由書·不婚之偉人〉、〈新民說〉、〈說常識〉、〈盾鼻集〉中提及，但真正有所論述的，乃撰於1911年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

而我國人愛國心之久不發達，則世界主義為之梗也。吉朋者，英國之良史也。所著《羅馬興亡史》，歐洲有井水飲處匪不誦之。其言曰：「羅馬自征服義大利以後，其人民無復愛國心。彼非不愛羅馬，然所愛者，羅馬之文化，非愛羅馬人，非愛羅馬國也。其人常以保存增長其文化為己任，以擴張其文化施於世界為己任。無論何族之人，有能完成此責任者，則羅馬人奉權力以予之不稍吝，故羅馬歷代帝王，起於異族者居其半。」

^⑤ 〈李鴻章〉（無署名），《新民叢報》1號，1902年2月。

^⑨ 《新史學》，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570。

至於梁啟超之正面表彰普魯塔克，有〈作文教學法〉、《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等，只是最為精彩的，當推1902年發表的〈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此傳竟五處提及羅蘭夫人閱讀普魯塔克的《英雄傳》。第一次出現時，作者還加了個按語：

按：布爾特奇Plutarch，羅馬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五十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臘羅馬之大軍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臘人羅馬人兩兩比較，故共得二十五卷。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近世偉人如拿破崙、俾士麥皆酷嗜之。拿破崙終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¹⁰

前者強調文化對於帝國的超越，欣賞「以保存增長其文化為己任」者；後者則突出傳記之英雄主義氣質，以及「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這種閱讀趣味，與西方學者的判斷不無相通處。

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提及「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許多人為了準備起義和誅戮暴君而讀普魯塔克的著作。」¹¹而湯普森的《歷史著作史》上卷則主張「應當把普魯塔克看作一位道德家，而不應當把他看成歷史家」；因為，「喚醒業已消失的希臘理想主義和對道德的尊重，幾乎是普魯塔克熱情而迫切地追求的目標」。扁平的人物造型以及簡要的敘述，或許不符合現代人的欣賞趣味，「但是從文藝復興到法國革命這段時期，普魯塔克的著作卻極受歡迎。」¹²

同樣是湯普森，在《歷史著作史》下卷，強調吉朋對歷史寫作方法及技巧的探討：「抓住歷史的連續性這個觀點的第一位作者就是他，而且他視野廣闊、學識淵博。」¹³而古奇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則稱：「吉朋的著作在古代世界與近代世界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它迄今仍是各民族的通衢大道；並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建築物都久已變成廢墟之後，仍然屹立著。」¹⁴

或許是注意到任公先生對於吉朋的欣賞，半個多世紀前，張蔭麟在大力表彰梁氏的史學著述時，故意將其與「吉朋、麥可萊、格林、威爾斯輩」相比較，而且認定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¹⁵到底誰該「瞠乎後矣」，這裏暫時不論；要說二者具有可比性，很可能指的是任公先生的學術史著述。傳統的學案體包含學者傳記、言行、著作摘要、相關評論等，尤其重視某一學派的承傳。而梁著在此基礎上，更突出時代風雲、思想潮流、歷史沿革等，尤其關注不同學派間的紛爭，以及各個學術領域的具體成績。若《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確實以其「視野開闊，學識淵博」，以及「在古代世界與近代世界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最為人稱道。

¹⁰ 梁啟超，〈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四冊。

¹¹ 克蘿齊著、傅仕敬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8。

¹² 湯普森著、謝德風譯，《歷史著作史》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59-160。

¹³ 湯普森著、孫秉瑩等譯，《歷史著作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122。

¹⁴ 古奇著、耿淡如譯，《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81。

¹⁵ 參見張蔭麟，〈跋〈梁任公別錄〉〉，《思想與時代》4期，1941年11月。

與學術史著述之注重整體感與連續性不同，梁啟超之開創評傳體式，則是以敘事生動、議論精闢，以及激情澎湃著稱。若〈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的開篇，當初不知吸引了多少熱血青年：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為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為法國大革命之母故。^⑯

可與此相媲美的，是〈義大利建國三傑傳〉結尾處的「新史氏曰」。表揚過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的赫赫功勳，堅信「吾儕讀史何為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的任公先生，忍不住大發宏論：

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發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不過對吾輩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勵云爾。嗚呼！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國有如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為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為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三傑，而無名之傑尚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為無名之傑，無名之傑遍國中，而中國遂為中國人之中國焉矣。^⑰

諸如此類的長篇大論，並不限於「開篇」或「結尾」。只要有感觸、能發揮，梁啟超隨時可以擱置敘事，插入洋洋灑灑、駢散相間的幾百乃至上千言的宏論。這與《史記》中蓋棺論定式的「太史公曰」，不可同日而語，明顯是另有淵源。

在1922年所撰〈作文教學法〉中，梁啟超談及「古今中外傳記名手」，舉的是「在歐洲則布魯特奇之《英雄傳》，在中國則司馬遷之《史記》」。^⑲而此前一年，梁啟超還專門表彰司馬遷「其最異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為本位」；這一點，「其價值乃頗類布林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林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⑲

《史記》乃中國敘事文學之祖，稱〈項羽本紀〉、〈信陵君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酈食其列傳〉等「皆蕭括宏深，實敘事文永遠之模

^⑯ 梁啟超，〈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四冊。

^⑰ 梁啟超，〈義大利建國三傑傳〉，《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四冊。

^⑲ 梁啟超，〈作文教學法〉，《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

^⑲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235。

範」，或者表彰其特別能摹寫人物神態，尤其善以小事見性情，²⁰都在情理及預料之中。不過，要說「讀名人傳記，最能激發人志氣，且於應事接物之智慧，增長不少」，²¹司馬遷其實不如普魯塔克更為本色當行。梁啟超所撰大量古今中外的人物評傳，基本上都以思想性、知識性見長，大處著眼，外加激動人心的抒情及議論。至於精妙的細節、入微的刻畫，不能說全然沒有，但確實非梁傳的主要特徵。這是因為，梁啟超所追摹的，主要並非歷代文人奉為圭臬的司馬遷，而是「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的普魯塔克。

說到「悲壯淋漓之筆」，自是不能不提及梁啟超極負盛名的「新文體」。在我看來，「新文體」之「筆鋒常帶情感」，「條理明晰」、「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等特點，固然在〈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新民說〉等政論中得到很好的落實；而上述〈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以及〈南海康先生傳〉等史述，同樣符合梁啟超對於「新文體」的界定。論者因主要關注「新文體」對於桐城古文、六朝駢儼或八股文章的挑戰，還有如何接引新術語和外國語法，不免重議論而輕敘事，相對忽略梁氏或長或短、或中或外的人物傳記。

鄭振鐸注意到〈南海康先生傳〉、〈李鴻章〉、〈袁崇煥傳〉、〈王荊公〉、〈義大利建國三傑傳〉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熱，有聲有色的；決不是什麼平鋪直敘的尋常史傳而已」，可限於體例，還是將其作為「歷史著作」，與代表「新文體」實績的政論文章區分開來。²²錢基博撰《現代中國文學史》，定梁啟超文體演變為六階段，從少年時代的學桐城，到後來的學漢魏，再到「新民體」之「晰於事理，豐於情感」，這前三段基本依據梁氏自述。從第四段起，方才見出錢氏的眼力：〈國風報〉時期梁文「已臻潔淨，樸實說理，不似《新民叢報》之渾



1911年梁啟超在台中公園與櫟社同仁合影
(左二為林獻堂，左五為梁啟超)

²⁰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及〈作文教學法〉，均見《飲冰室合集·專集》十五冊。

²¹ 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飲冰室合集·專集》十五冊。

²² 參見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小說月報》20卷2號，1929年2月。

灝流轉，挾泥沙俱下；然排比如故，冗長如故」；民國既建，海外歸來，因與林紓、陳衍、易順鼎等相遇從，梁氏「述志言情，間出儼體」；晚年專心講學與著述，且與新文化人胡適等交往，舍詩古文辭不為，而時時為語體文。²³錢先生的分辨頗為精細，只可惜囿于「文章」的觀念，不將「史著」納入論述的視野。

作為「史界革命」的發軔之作，《新史學》之〈論書法〉，固然涉及傳記、通史等著述體例問題，可所謂「悲壯淋漓之筆」、「發揚蹈厲之氣」，指向的卻是文章。這也難怪，〈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固然被作為文章廣泛傳誦，即便《清代學術概論》，當初也是作為文章來認真經營的，只不過因「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²⁴方才獨立成書。私心以為，《清代學術概論》乃梁啟超所撰最為成功的兼及「著述」與「文章」的代表作。

梁啟超平生撰述，早期主要是政論，後期則以史著最為出色。這當然只是概而言之，比如其對於評傳的興趣，便始終沒有改變。可研究者之表彰梁氏「文章」，大都集中在前期的政論，而不太涉及後期的史學著述。反而是在梁啟超剛去世時，有徐凌霄、謝國楨、鄭振鐸三文，為其後期撰述作了專門的辯解。如報人彬彬（徐凌霄）的〈梁啟超〉稱：

世人所認為真正之梁文，大抵皆以《新民叢報》所作為標準也。其用語體文於學術之講演，及整理舊藝之著作，亦出於自然。以新語體自有顯白條理之特長。此系實用問題，貴得其便。章士釗遽譏其阿附後生，降抑身分，則所見甚陋。此只是工具之運用耳。苟于宣意達詞為便，區區人我之界先後之分又何足論哉。²⁵

謝國楨作為及門弟子，其〈〈論七略別錄與七略〉跋〉的口氣，似乎略嫌誇張：

按先生少年之文，以豪邁勝；及夫壯年治學，以系統條理見長，故恒亦有疏忽之愆；及夫晚年，則由提要鈎玄，一變而為精湛纖密之作，而文則情韻不匱，真追東漢。²⁶

新文學家鄭振鐸的〈梁任公先生〉固然著重褒揚梁啟超《新民叢報》時期的撰述，但也不忘其後期寫作。鄭先生並沒有否認梁啟超歸國後的撰述文字風格與前不同，但頗有偏愛「雄奇」但不薄「恬淡」的意味：

他的文字已歸於恬淡平易，不復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氣勢，窒人呼吸的電感力了。讀《新民叢報》的文字，我們至今還要感到一種興奮，讀近年來的梁氏文字，則如讀一般的醇正的論學文字，其所重在內容而不在辭章。

²³ 參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383-407。

²⁴ 〈清代學術概論·自序〉，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123。

²⁵ 彬彬（徐凌霄），〈梁啟超〉，原載1929年1月26-28日〈時報〉，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頁19。

²⁶ 謝國楨，〈〈論七略別錄與七略〉跋〉，原載1929年3月5日天津〈益世報〉，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頁426。

對於梁啟超之追隨時代變化，改用白話寫作，風格由「氣勢雄健」一改而成「舒徐婉曲」，鄭振鐸認為，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反而是「此可見梁氏始終是一位腳力輕健的壯漢，始終能隨了時代而走的」。²⁷

193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現代學術的健康發展，梁啟超的許多具體研究成果被超越，而其「筆鋒常帶情感」，當初乃「新史學」的催化劑，如今則成了「不夠專業」的象徵。其論述之隨意、考證之粗疏，借用外來學說時之一知半解，使得作為「學者」的梁啟超，日漸遠離中國學界的主流。

倒是史家錢穆的一則私人通信，重新激起我們對梁啟超的強烈興趣，不過，這回不是「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而是其述學文體。1960年5月，錢穆給時正負笈哈佛的得意門生余英時寫信，稱「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其中專門表彰梁啟超的述學文字：

梁任公於論學內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一氣而下，有生意、有浩氣，似較太炎各有勝場，即如〈清代學術概論〉，不論內容，單就其書體制言，實大可效法。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實則在五四運動後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²⁸

這裏強調的是梁氏的「論學」，而且專門點出撰於五四運動後的各書各文，正可與上述鄭振鐸等人的說法相呼應。也就是說，事隔三十年，任公先生的「文章」重新引起關注，而且是一位頗為挑剔的史學家的關注。

又過了三十年，1990年代的中國學界，梁啟超的名字再次大放光彩。世人有欣賞其立憲政治的，有追慕其文學改良的，有發掘其國文教育主張的，更有表揚其引進外資思想的。任公先生本就興趣廣泛，言論駁雜，對當世的幾乎每個重大問題都發表過意見，於是，反省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任公先生成了最佳的入口處。但毋庸諱言，今日世人之普遍關注梁啟超，與其「平易暢達」的著述文體不無關係。這裏所說的文體，既包括前期「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的「時務文體」，也包括後期以白話為主的「醇正的論學文字」。



1911年梁啟超與長女梁思順
赴臺灣時在笠戶丸船上合影

²⁷ 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小說月報》20卷2號，1929年2月。

²⁸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余英時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之「附錄」（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

三、「極宜著意修飾」的「論學文字」

在同一封論學書劄中，錢穆還分別表揚了章太炎、陳垣、胡適等人的述學文體，並對王國維的考據文字「繁重處只以輕靈出之，驟讀極易領略，細究實多罅漏」，以及陳寅恪的「冗遲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始為可誦」，²⁹頗多非議。以下引征此信，並略做注解與發揮。

錢穆論學宗旨與胡適不同，可這並不妨礙其欣賞胡文。所謂「胡適之文本極清朗，又精勁有力，亦無蕪詞，只多尖刻處，則是其病」，³⁰大體準確；只是「尖刻」二字，在我看來，與適之先生的為人為文均不大能對上號。1920年代，陳西澄評選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不選《嘗試集》，也不選《中國哲學史大綱》，而選相對龐雜的《胡適文存》。³¹胡適本人對這一選擇很不滿意，稱「西澄究竟是一個文人」。³²其實，《胡適文存》中的長篇論文，與其哲學史、文學史專著，同屬述學文字，沒必要過分拘泥。1940年代，朱自清曾專門撰文，指導學生閱讀《胡適文選》：「他的散文，特別是長篇議論文，自成一種風格，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他的長篇議論文尤其是白話文的一個大成功。」³³這段話，基本上可移用來評價胡適的專業著述。

胡適的述學文章很受歡迎，當初影響極大，可這並非「無心插柳」。作為學者，胡適對於文章的經營，確實是很下了一番功夫。在〈科學的古史家崔述〉中，胡適徵引崔述35歲那年自陳有志著述而先從熟玩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三家文章入手的書信，然後大加發揮：

他這一番工夫實在不曾白費掉；他雖不以文名，但他的文章在清朝古文之中要算是第一流的了。和他同時的史學家，章學誠也講究文章，故能自抒所見；那作〈王荊公年譜考略〉的蔡元鳳因為文筆煩冗，便令讀者生厭了。又如近代廖平與康有為，同治今文學；康的思路明晰，文筆曉暢，故能動人；廖的文章多不能達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讀了。要知文章雖是思想的附屬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崔述於著作之先，力求能「自抒所見」的預備，這一層很可以做後人的模範。³⁴

學問家之為了能「自抒所見」而著意經營文章，與文學家之專注于文學創作，其實還是很有區別的；而廖平與康有為對近代中國思想界影響的大小，也不全然是文章的緣故。但胡適對於「述學文體」的理解與刻意經營，還是值得認真琢磨。³⁵

至於說到陳垣的「其文樸質無華，語語必在題上，不矜才，不使氣，亦是論

²⁹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253。

³⁰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254。

³¹ 陳源，〈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上），《西澄閒話》（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頁335。

³² 〈整理國故與「打鬼」〉，《胡適文存三集》第二卷（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頁213。

³³ 〈《胡適文選》指導大概〉，《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299。

³⁴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胡適文集》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76-177。

³⁵ 參見拙文〈胡適的述學文體〉，《學術月刊》2002年7、8期。

學文之正軌」，³⁶估計不會有什麼爭議。因陳文特色實在太明顯，作為考據文章，確實是本色當行。不過，啟功提醒我們，以嚴謹著稱的史學家陳垣，同樣富有「詩情和書趣」，其帶「自況」性質的聯語「百年史學推歐北，萬首詩篇愛劍南」，可見其志趣所在。³⁷之所以選擇《日知錄》式的論學文字，「只求通達不求文采」，乃有感于文學家不會著史書，故拒絕《新五代史》那樣的「借史作文」。³⁸雖然抗戰中陳垣史學思想有所變化，「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³⁹著述風格基本上沒有變化。援庵先生晚年撰〈談談文風和資料工作〉，批評「有一種文章，看起來洋洋大觀，而一句話繞來繞去，看了半天看不懂，不知他說的是什麼」，表面理由是「話要講明白，讓人看得懂」，實則堅持其「文字簡練」的一貫主張。⁴⁰

錢穆最為欣賞的述學文體，其實還屬章太炎。不再限定「義理」或「考據」，而是統稱之為「論學文之正宗」：

近人論學，專就文辭論，章太炎最有軌轍，言無虛發，絕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搖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體最當效法，可為論學文之正宗。⁴¹

這與太炎先生本人的自我估計，大致吻合。只不過在章太炎看來，以「學說」、「文辭」來區分文章，本來就不是明智的選擇。⁴²章氏的立意乃是「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文』論」，破除所謂「應用文」與「美文」的區別，強調「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⁴³這點得到文學史家胡適的高度讚揚。胡適甚至稱：「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將章氏的專業著述說成「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裏上品的文章」，⁴⁴這點很合太炎先生的口味。

1909年，針對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為五十家」，將章太炎與譚嗣同、黃遵憲、王闔運、康有為等一併列入，章太炎不滿，在〈與鄧實書〉中，除逐一褒貶譚、黃、王、康的學問與文章外，更直截了當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發表在《民報》上並廣獲好評的「論事數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淺露粗俗，「無當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詰屈聱牙、深奧隱晦的學術著作如《訄書》等，「博而有約，文不奄質」，方才真正當得起「文章」二字。⁴⁵在《國故論衡·論式》中，章太炎又

³⁶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253。

³⁷ 啟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見《勵耘書屋問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頁106。

³⁸ 蔡尚思，〈陳垣先生的學術貢獻〉，見《勵耘書屋問學記》，頁23。

³⁹ 〈致方豪〉，《陳垣先生往來書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年），頁172。

⁴⁰ 〈談談文風和資料工作〉，《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636-637。

⁴¹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253。

⁴² 參見章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丙午年第九至十一號，1906年10-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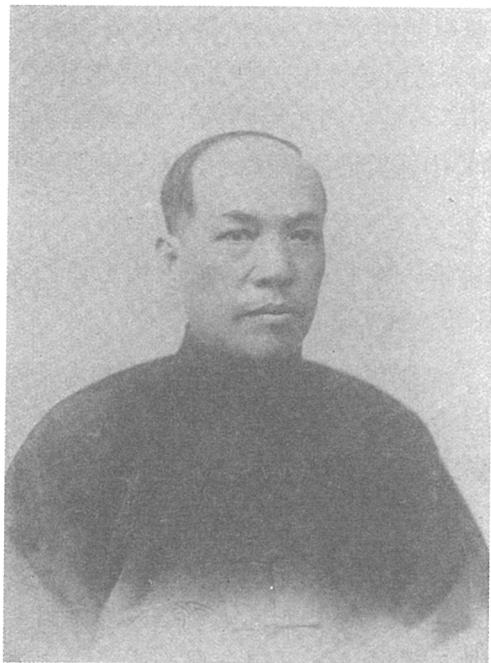
⁴³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23-124。

⁴⁴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23-127。

⁴⁵ 〈與鄧實書〉，《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69-170。

進一步區分「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的文士之文與「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的學者之文，⁴⁶而且明顯傾向於後者。

史學史家大都注意到這樣一件事實，就在梁啟超提倡「新史學」的同時，章太炎也在醞釀新的「中國通史」的撰述。1902年7、8月間，章太炎屢次致信梁啟超及吳君遂，表達自己借鑒社會學，從事學術志及通史寫作的願望。其中提到：「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⁴⁷這些思路，完全可與梁啟超所提倡的「新史學」互相發明。而且，就在這一年，章太炎「刪革」日後被自家和後人作為「文章」來表彰的《訄書》。也就在這一年，太炎先生「綜核名理，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於是文章漸變」。⁴⁸



梁啟超1927年(55)歲時攝影

讀余英時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所附錄的〈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實在佩服錢穆先生對各家述學文字風格的精確體味。作為史學家而如此關注述學文體，我相信是與其早年的求學經歷有關。在《宋明理學概述》的〈自序〉中，錢穆追憶自家的治學經歷：最初從韓柳文入手，後「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轉治晦翁、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由黃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又上溯五經；後「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⁴⁹余英時對錢先生這段懇切的自敘十分欣賞，不過更多強調「史學立場」為錢先生提供了一個超越觀點，使他能夠打通經、史、子、集各種學問的千門萬戶」；⁵⁰我則更關注錢先生早年的浸染唐宋八大家古文，如何影響其一生著述。舉《國史大綱》為例，世人多關注書前所要求讀者的「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其實更應該注意的，是那長達34頁的「引論」。⁵¹不說其中所體現的史家的政治立場與憂患意識，單是文章本身，便值得認真體味。《師友雜憶》第十一章提到，此「引論」當初刊之報端，曾引起巨大爭議；陳寅恪

⁴⁶ 章炳麟，〈論式〉，《國故論衡》（東京：國學講習會，1910年），頁117-124。

⁴⁷ 〈章太炎來簡〉，《新民叢報》第13號，1902年8月。

⁴⁸ 《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上海書店，1986年），頁9。

⁴⁹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

⁵⁰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35。

⁵¹ 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之「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和「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第三版）。

斷其為「大文章」，還提醒張其昀「君必一讀」。⁵² 這雖是錢先生自家的回憶文字，但我相信這一說法。

余英時在淬礪其述學文體時，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錢穆的意見，或者另有「暗度陳倉」的高招，在找到進一步的確證前，不好妄下結論。但錢先生以下的建議，確實讓我們看到余先生日後學術及文章發展的某種趨向：

弟之文路，多看《鮚埼亭集》為近，自全祖望上參黃宗羲《明儒學案》各家之序，此是絕大文字，以黃、全為宗，再參以清代各家碑傳，于弟此後治學術思想史行文，必有絕大幫助。⁵³

依然健在的史學家中，能兼及考據與論述，撰寫酣暢淋漓的「絕大文字」者，為數實在不多；而余英時名列其間，當之無愧。就像錢穆所說的，「作考據文字較易，作闡述文字較難，專從一點說之易，而兼綜並包者難」——後者需要全史在胸，需要駕禦全局的能力，需要「於主要觀點刻意沉潛反復，有甚深自得之趣」，方可下筆。這樣的文章，方才有可能追蹤「雖有未精，然元氣淋漓」的乾嘉以前著述。⁵⁴ 錢穆此說，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關於清初學術的評述，可謂異曲同工：

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⁵⁵

照任公先生的說法，此乃「啟蒙期之特色也」。而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極為難得的學問及文章境界。這種境界，梁啟超嚮往之，錢穆、余英時何嘗不如此？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八章，梁啟超論述清初史學之建立，專門表彰全祖望的性情與文章：

若問我對於古今人文集最愛讀某家？我必舉《鮚埼亭（集）》為第一部了。全謝山性情極肫厚，而品格極方峻，所作文字，隨處能表現他的全人格，讀起來令人興奮。……他所作南明諸賢之碑誌記傳等，真可謂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盡情，使讀者自然會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注略）他最善論學術流派，最會描寫學者面目，集中梨洲、亭林、二曲、季野、桴亭、繼莊、穆堂……諸碑傳，能以比較簡短的文章，包舉他們學術和人格的全部，其識力與技術，真不同尋常。⁵⁶

對比梁啟超「筆鋒常帶情感」的評傳，以及條理貫通、見識高邁的學術史，當能

⁵²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198頁。

⁵³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254-255。

⁵⁴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見《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頁252-256。

⁵⁵ 《清代學術概論》，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127。

⁵⁶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98。

明白任公先生與全謝山的學問文章，頗多淵源。而錢穆、余英時師徒撰寫史論時之追求「絕大文字」，似乎也與梁啟超、全祖望血脈相連。

四、史家的「文人習氣」

全祖望極其崇拜黃宗羲，然亦不阿其所好，在《鮚埼亭集·答問南雷學術帖子》中，對梨洲先生不無譏諷：「文人之習氣未盡，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梁啟超認同此說，稱：「這段話把梨洲的短處，也說得公平。總之梨洲純是一位過渡人物，他有清代學者的精神，卻不脫明代學者的面目。」⁵⁷我卻不這麼看，沒有完全蛻變成只講經史、不弄文章的清代學者，或許正是黃宗羲的可愛之處。其實，全祖望本人的學問與文章，其佳妙處也正在此。只是囿於時代風氣，一說到學者的「擅長文章」，便有點旁騖雜收、學問不夠精粹的意味。黃宗羲《南雷文案·李杲堂文鈔序》稱，「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這當然是理想狀態。可劉師培明確告訴我們，清代學者大都「不復措意於文詞，由是學日進而文日退」。⁵⁸梁啟超則換一種說法，稱「我國文學美術，根柢極深厚，氣象皆雄偉」，只是因「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諸此方面，故一時若甚衰落」。⁵⁹

文章別是一家，關乎才學，也關乎性情，並不一定隨著學問的長進而長進。這一點，梁啟超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概跟論者本人的趣味、能力以及發言的姿態有關，梁啟超立論時反而刻意貶抑文章的功用。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梁啟超論「史家的四長」，發揮唐代劉知幾和清代章學誠關於史學修養的論述，並有所修正與創新：

至於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玄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於才學識之後。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後纔說到史才。⁶⁰

將「史才」放在「史家的四長」的末位，如此輕視「史家的文章技術」，與梁啟超本人的氣質有關。對於才華橫溢的任公先生來說，根本不能想像，表達精確、文采飛揚怎麼可能會是個難題！

可看梁啟超談論「史德」之必須剷除「誇大」、「附會」、「武斷」等毛病，或者講「史學」時之傳授「關於專精下苦功的方法」，還有「史識」如何依賴於「正確精密的觀察力」等，說實話，都不見十分精彩。倒是最後出場的「史才」，頗多可圈可點處：

⁵⁷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頁145。

⁵⁸ 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國粹學報》26期，1907年3月。

⁵⁹ 《清代學術概論》，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214。

⁶⁰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371。

史才專門講作史的技術，與前面所述三項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術的。有了史德，忠實的去尋找資料；有了史學，研究起來不大費力；有了史識，觀察極其銳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歷史來。要做出的歷史，讓人看了明瞭，讀了感動，非有特別技術不可。此種技術，就是文章的構造。章實齋作《文史通義》，把文同史一塊講。論純文學，章氏不成功；論美術文，章氏亦不成功；但是對於作史的技術，了解精透，運用圓熟。這又是章氏的特長了。^{⑥1}

至於何謂「史家的文章技術」，梁啟超主張從「組織」與「文采」兩方面著眼。前者包括「剪裁」與「排列」，乃史家必備的基本功：「此事看時容易，做時困難。許多事實擺在面前，能文章的人可以拉得攏來，做成很好的史。文章技術差一點的人，就難組織得好。沒有在文章上用過苦功的人，當時感覺困難。」後者相對複雜些，似乎不必強求。

「文采」的要素很多，梁啟超選擇最為關鍵的兩點。一是「簡潔」——即便對「章無剩句，句無剩字」的解說不盡相同，史家一般都會認同行文需「簡潔」的主張。真正顯示梁啟超趣味的，其實是第二點，即「飛動」：

為什麼要作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尤其是歷史的文章，為的是作給人看。若不能感動人，其價值就減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謹嚴，一面要加電力。好像電影一樣活動自然。如果電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飛動，而文章呆板，人將不願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戲的人，唱到深刻時，可以使人感動。假使想開玩笑，而扳起面孔，便覺得毫無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動，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學之類，尚可不必注意到這點。歷史家如無此種技術，那就不行了。^{⑥2}

梁氏接下來比較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畢沅的《續資治通鑑》，二者體裁一樣，可感染力卻有天壤之別。不是史實的差異，而是前者文章飛動，後者則顯得相當呆滯。由此可見，對於史家來說，「此種技術，非練習不可」。

這段關於「文采」的議論，在梁啟超或許只是信馬由驥，但因有豐富的寫作經驗作底，顯得十分貼切、自然。強調史學著述必須認真經營，「讓人看了明瞭，讀了感動」，以及追求「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的效果，且將其作為「好文章」的重要指標，我相信這是梁著獲得巨大成功的「獨得之秘」。

讓「史才」在「史家的四長」中叨陪末座，如果不是故弄玄虛，以求超越前賢；那便是推己及人，以為天下史家都能寫出一手好文章。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梁啟超之表彰顧炎武、黃宗羲，或者申明「我最愛晚明學者虎虎有生

⑥1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382-383。

⑥2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頁386。

氣」等，對於熟悉其學術思路及文章趣味的人來說，都在意料之中。倒是大力褒揚戴名世，頗發人深思。戴君罹奇冤以死，固然值得同情；但將其置於「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而且自甘「俯首」，實在出人意外：

其史雖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遺文數篇，足覘史才之特絕。其《子遺錄》一篇，以桐城一縣被賊始末為骨幹，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勢乃至明之所以亡者見具焉，而又未嘗離桐而有枝溢之辭；其《楊劉二士合傳》，以楊畏知、劉廷傑、王運開、運宏四人為骨幹，寥寥二千餘言，而晚明四川雲南形勢若指諸掌；其《左忠毅公傳》，以左光斗為骨幹，而明末黨禍來歷及其所生影響與夫全案重要關係人面目皆具見。蓋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於組織，最能駕馭資料而熔冶之，有濃摯之情感而寄之於所記之事（不著議論），且蘊且泄，恰如其分，使讀者移情而不自知。

以吾所見，其組織力不讓章實齋，而情感力或尚非實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俯首，此兩人而已。^⑬



1928年梁啟超生前所攝最後一張照片

以文集之文來褒貶「史家」的「史才」，本就有點蹊蹺；如僅涉及「組織力」與「情感力」，似乎只能證明「文章有天才」，而不該貿然闖入「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問題在於，梁啟超並不覺得如此比附有何不妥。可見其心目中，「史才」其實並不易得，極為精彩者，同樣值得「俯首」。

所謂的「文人習氣」，落實在具體的史學著述中，可能是無識大體，「流連於枝葉」；也可能是「善於組織，最能駕馭資料而熔冶之」。二者都能使得原先「扳起面孔」的史著，帶上某種「文學性」，只不過一「輕浮」，一「飛動」，得失之間，幾不可同日而語。正是基於此，我並不概排斥史學著述中的「文人習氣」。尤其是當下中國，「實證史學」成為主流，史家根本不屑於講求著述中的「組織」與「情感」，更不要說

著意修飾「論學文字」，其著述因而日漸枯燥，很難再「感動」專業圈外的讀者。此時重溫梁啟超的經驗，不無好處。

更何況，在我看來，所謂的「文人習氣」，不一定落實為文體上的「平易暢達」或「辭采靡麗」，而更體現在一種不同于史家（或其他專業學者）的眼光、立場、趣味，以及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在某些方面，比如對千古不變的人性的發掘、

^⑬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頁411。

對已經消逝了的情景的懸想，對研究物件的體貼入微，對文本內外的沉潛把玩，還有古今對話的欲望、直覺領悟的能力，以及豐富的人生體驗與想像力等，「文人」似乎並不比「史家」差。如此立說，並非顛倒時論，在史學領域裏以「文人」取代「專家」；而是主張學有專門的「史家」不必刻意回避「文人習氣」，以免自家生命以及筆下文章過於乾枯。

強調「史學」不見得非遠離「文學」不可，這點，與時賢之借渲染「史學」的「科學性」提高其學術品位的努力，基本上是背道而馳。暫時不追究「科學」作為學科、作為方法、作為人生觀、作為主義的巨大差別，也不想引入後現代的歷史觀，就按一般的解說，「史學」也都不可能與「文學」、「藝術」絕緣。

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在英國思想家羅素看來，這是十分清楚的，沒什麼好爭論。針對世人對於科學的過分崇拜，在〈歷史學作為一種藝術〉的演講中，羅素甚至稱：「歷史中的科學規律並不像人們有時認為的那麼重要，或那麼容易被發現。」而「歷史著作必須是有趣味的」這一基本要求，使得講求「文學技巧」，變得並非可有可無。作為例證，羅素提出來的，恰好就是普魯塔克和吉朋；而且具體論述時與當年梁啟超《新史學》中的思路非常接近：吉朋「他是用豐富的想像力寫的，而不是只懷著記述已知事實的冷靜的願望去寫的」，即使不符合歷史規定情景，「卻使人有一種非常逼真的感覺」；「普魯塔克的《希臘和羅馬名人傳》鼓舞著很多具有非凡抱負的年輕人度過英勇的一生；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可能就不去冒險了」。⁶⁴

在〈怎樣閱讀和理解歷史〉一文中，羅素再次提及「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布魯塔克就一直是古代歷史學家之中最有影響的人，——但確實並非是在歷史學作家們中間（因為他一點也不可信），而是在實際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們中間」；而作為史學家的吉朋，「儘管他對個人的描繪往往令人失望，而他對偉大事件進程的感受則是準確無誤的。沒有別人曾經提出過一幅歷史綱要，能比他做得更好」。⁶⁵或許，在羅素看來，對具體人物性格的生動描繪，以及對整體歷史進程的準確把握，二者乃歷史學家的基本功，也是史學之兼及「科學」與「藝術」的重要特徵。而這，恰好可以普魯塔克和吉朋為代表。

在中國史學界，最早明確承認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的，當推英年早逝的史家張蔭麟。在其發表於1928年的〈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中，有這麼一段名言：

惟以歷史所表現者為真境，故其資料必有待於科學的搜集與整理。然僅有資料，雖極精確，亦不成史，即更經科學的綜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神彩，有待於直觀的認取與藝術的表現也。⁶⁶

64 羅素著、何兆武等譯，《論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頁62-83。

65 參見羅素著、何兆武等譯，《論歷史》，頁25-26。

66 張蔭麟，〈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學衡》62期，1928年3月。

如果承認史學應該兼及科學與藝術，而不簡單地推崇「史學便是史料學」，那麼，對於梁啟超的史學成就，評價可能會更高些。

也正是這位才高氣盛的張蔭麟，在〈跋〈梁任公別錄〉〉中，針對世人之批評梁啟超考據不夠精當，作了如下精彩的辯解：

雖然，考據史學也。非史學之難，而史才實難。任公在「新漢學」興起以前所撰記事之巨篇，若〈春秋戰國載記〉（在《飲冰室合集》中首次刊佈於其身後，世人注意之者甚少），若〈歐洲戰役史論〉，元氣磅礴，銳思馳驟，奔磚走石，飛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復能自休者，置之世界歷史著作之林，以質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麥可萊，格林，威爾斯輩，皆瞠乎後矣。曾試自操史筆之人，讀此等書而不心折者，真無目耳。⁶⁷

說到麥可萊，我想起美國史學家 J· W· 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中的一段話。在論及麥考萊等三位英國偉大的文學家兼歷史家時，湯普森稱：

他們的著作和吉朋的著作類似，即使被見解更正確、細節更可靠的著作取代之後，可能仍然會繼續流傳。⁶⁸

我相信，梁啟超許多精彩的人物評傳以及《清代學術概論》等，都會有這種幸運。

與文學家爭鋒，當然不是史學家的主要任務；但出神入化的謀篇佈局，以及變幻莫測的敘事技巧，何嘗不是史家的基本功？分析史學固然更多借重理論與史料，至於敘事史學，文學手法是必不可少的。我同意湯普森的說法，「雖然歷史科學已經提出更高的問題，但這種？事史永遠不會被廢棄，永遠不會死亡」，因為「從好奇心和想像力產生的對驚險事件的樸素的興趣也是一切年代都有的」。⁶⁹

即便以分析為主，「史才」同樣不可或缺。照羅素的說法，比起辭藻、文采、情緒等，史家的述學文體更值得關注：「文體，如果是好的，乃是作家感情方式的十分個人化的表現。」⁷⁰此語既可證以吉朋之苦心經營，為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而「在呆板的記事體和誇飾的論辯體之間選定一種適中的筆調」，⁷¹也可呼應錢穆對章太炎等各具特色的論學文字的精彩評點，更可完善鄭振鐸、錢基博等人關於梁啟超文體演變內在動因的解說。

漢語語境中的「新史學」，經由梁啟超等人的大力倡導，百年間成績斐然。論者面對這種既令人振奮、又不無遺憾的局面，無論是回顧、反省還是展望，多從理論提升、史料擴容以及學科拓展角度立論，而很少考慮表述方式的革新。對於

⁶⁷ 張蔭麟，〈跋〈梁任公別錄〉〉，《思想與時代》4期，1941年11月。

⁶⁸ 湯普森著、孫秉瑩等譯，《歷史著作史》下卷，頁401。

⁶⁹ 湯普森著、謝德風譯，《歷史著作史》上卷，頁30。

⁷⁰ 羅素著、何兆武等譯，《論歷史》，頁72-73。

⁷¹ 戴子欽譯，《吉本自傳》（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156：「一個作家的文筆，應當是他的心靈的映象，而語言的選擇和駕馭，則是長期操練的結果。我做了多次試驗，然後才有可能在呆板的記事體和誇飾的論辯體之間選定一種適中的筆調。第一章起稿三次，二、三兩章起稿兩次，方才覺得差強人意。」

基本是門外漢的我來說，本文的主要目的，無非是想為「史界革命」補充一個不太為人關注的側面，即，「述學文體」值得認真經營，並非只是無關緊要的「雕蟲小技」。